

客家研究的理性思考

客家研究肇始于 19 世纪 50 年代。它与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社会问题扭结在一起，形成多次研究高潮，影响及于国内外学术界与社会诸多阶层。至本世纪 30 年代 罗香林先生推出全面论述客家历史的力作《客家研究导论》，使客家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尔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客家研究在大陆逐渐“冷却”，以致“客家”问题成为知识界一门颇为生僻的学问 鲜人问津。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加强，客家研究已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兼之海外客属团体与学人雅士的推波助澜，业已形成一个新的热潮。研究会、联谊会纷纷建立 期刊、报纸时有新出 文章多 会议也多 可谓盛况空前。作为客家主要聚居地之一且又长期处于沉寂状态的江西学术界，也从以往封闭中走了出来，加入了客家的研究行列。

毫无疑问 客家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历史与时代课题。时下的“客家热”也的确涌现出许多令人兴奋的成果，解决了一些问题。然而仍有一些学者如吴泽先生等 认为近年的客家研究 没有超过罗香林先生 30 年代的水平。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了解，笔者由惊愕转为赞同此类看法。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笔者希望客家研究的大好局面能长此以往，并且有一个质的突破；客家研究的成果能够得到更多学界同仁的认可与嘉许，从而在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诸领域中占领应有的一席之地，故斗胆直陈，草就此文。

目前客家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固然在于“大多数止于就事

论事 很少触及这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 ”; 远不足以涵盖客家民系千百年来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 “ 基本上停留在表面的、个别的、辩论性的研究阶段, 尚未上升到系统的学科建设和理论构建阶段 ”^{〔1〕} 在于“ 未加分析 寻章摘句 …… 陈陈相因 沿袭《导论》旧说 ”^{〔2〕}。笔者还感觉到个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感情主义的束缚, 未能实现理性的超越。

历史上的客家研究是在当时华南地区土客矛盾激化, 争斗的频繁, 社会上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对客家这一庞大的移民群体给予的种种偏见和鄙视的背景下出现的。为了从文化上反击社会敌对势力视客家为“ 客贼 ”, 客家非粤种亦非汉种 ”, 客家乃山地野蛮退化部落 ” 的种种侮辱, 客家民系中的知识阶层纷纷起来论证客家的汉族源流 并相继成立了“ 客家源流研究会 ”、客家源流调查会 ”、客系大同会 ” 等组织 以传单、报刊、著作的形式向社会介绍客家的谱系族源、文化习俗与历史功绩。所谓矫枉必须过正, 这些对自己的民系饱含感情的研究者们, 为了维系集团的团结力以及客家的正统性, 也开始借助于一些外国学者的论述与谱牒资料 神化自己的来龙去脉, 美化自己的社会、文化特点及价值观念。自罗香林先生发表《客家研究导论》以来 这种感情主义 日本学者称为“ 客家的民族主义 ” 的客家历史体系便被建构起来 并且一直相沿至今。即便是罗氏自己认为的因“ 研究日短 材料不备 虽欲论列, 穷其究竟, 而为事势所不许 ”^{〔3〕}而留下的种种缺憾, 也成为后继者竭力论证、渲染的历史话题。

时下客家研究中存在的感情主义问题, 除有其历史根源外, 还与客家研究的队伍成分有关。客家问题的研究者与支持者, 绝大多数是具有浓厚的民系自豪感的客家人, 非客家人士比较少。这种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重合, 以及联谊活动中屡屡出现的感人至深的场景, 在深笃乡情的同时, 也必然使研究中的感情主义倾向更加强烈。这种倾向难免影响客家研究的理性思考, 从而削弱了结论的

准确性与科学性。

客家研究必须率先解决的基本概念问题 如‘客家’等 至今仍然是比较模糊的。在感情主义研究心理的驱使下，为了证明“客家”一名得来很早 自古有之 借以表现客家历史的源远流长 于是不加区别地在史籍中搜寻依据 附会假说 因而相率认为：“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志云：‘南兖州 镇广陵。时百姓遭难 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发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 为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 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其后到了唐末 政府簿籍 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 则为民间的通称。”^{〔4〕}其实东晋的“给客制度”是封建国家在承认豪强世家占有劳动力的前提下，限制其占有劳动者的数量，以保证朝廷有足够的课役来源的一种制度，是封建国家与门阀地主争夺劳力在经济制度上的反映。所给之客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依附农民，与“客家”风马牛不相及。晋代的‘客’皆注家籍 隶主人名下。到唐中期 由于门阀士族地主势力的衰落，‘客’的身份地位有所提高 人身束缚有所松弛。唐玄宗时 宇文融检括户口 得客户八十余万 全部编入国家户籍。北宋户籍分主、客户。主户五等 是拥有土地的人户，包括大中小地主以及自耕农、半自耕农阶层。客户是指没有土地需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一旦他们在获得了小块土地之后，也可上升为主户。主、客之分 南北皆然 与“客家”仍然毫不相干。这些问题在史学界早有定论，已成一般历史常识，然而在客家研究中 这种错误却相延半个多世纪 的确令人诧异^{〔5〕}。

为了强调客家与中原祖地的联系性，编排客家名人辈出的群英谱，有的研究者不恰当地扩大了客家外延，举凡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家无不视为客家。于是薛仁贵、郭子仪、钟绍京、岳飞、欧阳修、王安石、朱熹、文天祥、李烈钧等人都归入了客家名人的行列。这种“泛客家论”无视客家作为一个民系的独特内涵 混淆民系差异性，

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客家的存在。这种认识的逻辑归宿必然是天下无处不客家。推而言之，我们甚至可以说美洲的客家最多，因为那里除了几近灭绝的印第安人以外，全都是外来移民。

感情主义客家研究的最大危害是，在客家研究领域内滋生了变相的、陈腐的“种族民系优越论”与“纯粹血统论”。比如说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是“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有如牛乳中之乳酪一般；“中国最卫生、勤劳和进化的民族就是客家人”；“中华民族的特性是保留的、保守的，但客家人例外，因为客家人的特性，客家人的精神，都是革命的、进取的”；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客家的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为了支撑这些近乎荒诞的命题，一些感情主义的客家研究者开始从血统、遗传、革命精神的历史表现等方面展开必然复归于荒诞的论证。

首先是“纯粹血统”的提出。这里他们借用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敦(Ellsworth Huntington)的话：“客家人是十分纯粹的华人，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有和外族的血统发生过混合。”于是客家被誉为最重“保种”、“保族”的人。“保种”是保持自己血统的纯粹，不与外族通婚；“保族”是保持自己的民族属性不变，或许还包涵了延续家族烟火的意思。《客家学研究》第二辑有文章对客裔通婚之说煞有介事地提出了批评，并认为客家“长期受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以及自身的血统优越感的关系，因而对畬族采取鄙视的态度，更谈不上与他们发生婚姻关系”。彻底否认了客家与外族通婚的事实。然而在该文的结尾却又自顾不暇地露出了破绽：“在封建社会，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以及汉族具有较高的生产方式等原因的影响，畬族无法摆脱要么迁徙保种（如迁往闽东深山老林），要么和汉族认同而被汉化的命运。那些与外种人通婚的畬族人后裔，正是客裔杂居地区的已被汉化了的那部分畬族后裔。而严格说，他们已经是汉人，不再是畬民了，因为他们失去了独立的

生产生活方式、语言、风俗，从而也失去了保持纯洁的民族血统的意义。^{99〔6〕}“汉化”是指失去本民族的固有特性而与汉族融合于一炉。难道汉化了畲族后裔（指单纯失去独立生产生活方式与语言习俗者）就突然消失了原有的血统吗？他们与客家人的通婚就不再产生血统混化的事实吗？客家人以其较高的文明带动了畲族的汉化，况且汉化的过程本身就存在着通婚、生育、血统交融的现象。汉化既是文化上的，也是血统上的。关于血统的讨论，是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具有纯然不杂的血统，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混杂的现象。客畲通婚问题，我们在社会调查中已经获得一些肯定的事例。罗香林先生虽也大谈客家民系的优越性以及强者的遗传，然于“纯粹血统”问题出言也比较客观、谨慎。他说：“客家初到广东、福建的时候，不能不同畲族互相接触。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中，没有健壮的体魄而要到达安全的境地是很困难的。所以能携同原日妻室抵达的人，自然不必遽与土著通婚，但其他没有原日妻室同时履止的，那就只好降格以娶土著妇女为妻了。”当然，这里罗氏没有明说土著就是畲民，但畲民却是土著的一个重要部分则是肯定的。因此，罗氏在《客家源流考》一书的“结论”部分于引用的韩廷敦氏的话之后，又郑重说明：“所谓‘纯粹’固然是比较的说法。”^{99〔7〕}同“纯粹血统论者”区别了开来。但罗氏依然是一位“血统论”者。他认为客家人的上代原本是中原贵胄，他们在辗转南下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和惨酷牺牲，由于自然与社会诸因素的淘汰与选择的作用，使最终到达目的地的，都是一些被选择的强者。“所以在种族的遗传说来，客家民系实在是一群强者的血统。他们之所以能保世滋大，全在他们有这种强者的遗传；他们之所以能抵抗一切的压力，从事各种革命运动，也全在他们有这种强者的遗传。这遗传是曾经付了很大的代价，才获得的。所以客家人士，自来也很重视他们的血统。”^{99〔8〕}

早期的客家研究者，为了申明自己的汉族族性，标榜自己的血

统纯粹或血统优异，借以抗击社会上视客家为少数民族，为“山地野蛮、落后部落”的种种歧视，因而对“混血”之说尤其忌讳。这是特殊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时至今日，客家人面临的社会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客家人的汉族性质和历史地位已为世人公认，歧视现象已不复存在。再去重弹旧调，不仅于时宜不合，而且也潜藏着新的民族歧视的因素，不利于民族的大团结。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不谈为好。

关于客家人源出中原贵胄，是支撑“客家民系优越论”的另一个古代历史依据。其说发绪于罗香林等早期客家研究者，而时下的“客家热”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大凡客家人所有的生活习俗与优良传统都是因为他们祖出中原的衣冠士族。论证的过程无非是：“客家先民几乎都是中原人士，并且多‘衣冠’、‘士族’之人”，所以客家人是中原衣冠的后裔，因而也就继承了中原衣冠之家“以门户自高”、“重‘木本水源’、念祖孝悌、敦亲睦族、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功名等习俗传统，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正统观念。

所谓“士族”，指东汉以后地主阶级内部形成的享有政治与经济特权的高级阶层，由各地大姓豪族构成。又称势族、门阀世族、衣冠望族、世家大族。非士族的地主阶级则称为庶族、寒门。士族占有大片的土地和劳动人手，政治上世代高官。家世声名是衡量身份地位的最高标准，因而他们最重谱牒。官府设有专门的谱局，“有司选举，必稽族谱而考其真伪”。他们也非常注意保持其高贵的血统，实行士族内婚制，讲究门当户对，严防“婚宦失类”。永嘉之乱后，士族随晋室渡江。王导等北方大族联合南方土著士族共同辅佐东晋元帝司马睿稳定统治。登基大典上，司马睿为表谢意，要拉王导共坐御床，因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士族势力发展到顶峰。南朝时期，士族逐渐走向衰落，经历史次政治变乱与农民起义的打击，于唐末退出了历史舞台。

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高级特权阶层，人数不在多数。自东晋至

刘宋末，大量的北方人民为避战乱而分次南迁。在庞大的移民浪潮中，士族所占比例极少。而且士族中的右姓又多迁建康一带，与客家先民关系不大。至于进入赣、闽、粤山区成为客家人的移民中，世家大族更是微乎其微，对客家民系属性的形成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况且在客家民系形成的孕育阶段，门阀士族正处于衰落时期。保证士族垄断政权的选官制度开始变化，南齐时出现了寒人掌选，梁朝选官则已是“无复膏粱寒素之隔”^{〔9〕}，士籍冒滥，谱牒失去了原有的神圣性；婚媾沦杂，罔计厮庶^{〔10〕}。士族本身的腐朽更是惊人。他们由于有特权保障，尽管朝代更替，地位依然如故，因而在政治上不求振作，以空话为荣，实干为耻，甚至“不乐武位”^{〔11〕}，以不问军国大事为清高。他们只想着自己，关心自己的家族利益，而将国事抛于脑后，更不用说有什么强烈的民族意识了。他们凭出身为官，不必发奋进取，因而多为不学无术之士；“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12〕}，以作弊为能事，根本谈不上推崇知识和教育。生活上极端奢侈腐化；“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13〕}。哪里找得到客家人克勤克俭的精神来？公元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这些长期过着腐朽寄生生活的大族们“肤脆骨柔，不堪于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14〕}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15〕}没有一点在政治风云中的应变能力。“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余家，……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16〕}又有几个进入赣、闽、粤山区成为客家？东晋至北宋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期，也是门阀士族由巅峰走向衰落，直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秋霜期。这个时期士族的腐朽性已暴露无遗，这样的士族风气难道还有什么承继的价值及夸矜的荣耀吗？

通常在论证客家源系中原贵胄时，照例要引述一大通族谱资料。中国的家谱无不从“受姓之始”谈起，而且必定要列出若干代以前的某个祖宗曾是高官显宦。故俗语云：无高官显贵不成姓谱。元

人揭傒斯也说：“凡天下之受性命氏，未有非圣之后也。”^{〔17〕}笔者参观福建宁化石壁新修之“张氏家庙”，东厅壁用红纸大书《张氏远祖先贤简介》，自黄帝第五子挥公以下有张果老、张良、张骞、张衡、张仲景、张飞等历代名人仙客。所阅之《何氏族谱》也必推何仙姑。族谱中此类穿凿附会，荒诞无稽之处，不胜枚举。故宋人文天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族谱材料“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18〕}。今人谭其骧先生也说：“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19〕}至于标榜堂号，天下姓族莫不如此，其理一同族谱，并非客家人独有，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们与同姓陌生人邂逅而遇，常以玩笑而又不失亲切的口吻说：“五百年前是一家。”这样的戏言当然不能作为“史料”用于科学研究。我们不否认族谱资料对研究移民史、人口史以及客家史的重要价值，但族谱资料的运用要注意去伪存真，要有严谨科学的态度。

在感情主义的客家研究者看来，客家民系的优越，客家精神的伟大，还表现在“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这样一个错误的命题上。这一错误说法的始作俑者是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其理由是：“翻开数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当推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几乎全部参加革命的将领，都是客家人。其次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除了其本人乃为客家的后裔以外，其他主要助手，亦有许多是客家人。可以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的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20〕}时下的客家研究中又有人进一步引申发挥，认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决策人是客家人，又在客家地区暴发和发展革命，完全可以证明‘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客家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政治变动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及经济根源；革命的策源地和大舞台不仅只局限于客家地区；革命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有客家人，更有其他汉族民系的人以及少数民族人；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的各族人民。我们可以说客家

人在中国革命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占有非常突出的历史地位，但我们不应该将‘革命’的概念狭隘化、庸俗化。不能因为某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及主要助手是客家人，便将之说成是客家革命。客家人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革命决不等于客家革命。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革命运动席卷全中国。这样一场伟大、深刻的革命运动，难道可以因为客家人的后裔孙中山先生领导，“其他主要助手，亦有许多是客家人”就可以说成是一场单纯的客家革命吗？没有客家，便没有辛亥革命吗？李世民为帝的唐王朝可以说是“李唐王朝”，是“李家的天下”。客家人的后裔孙中山先生就任总统的中华民国，难道也可说是“客家的王朝”吗？

客家民系由于其特殊的迁徙经历与生存环境的磨练，养成了许多可贵的品质，其精神值得赞美弘扬。然而对‘客家精神’的研究也要持审慎理智的态度，要注意民族共性与民系个性的关系，并有一个切当的表述。即便是对客家本身，也要作具体的分析。笔者认为：客家人就其精神面貌和性格差异而言，存在三种类型——山区客家、沿海客家及海外客家。山区客家是大本营的客家，这部分客家人人数最多，由于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历史包袱沉重，落后、保守的因素比较多；兼之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商品经济不甚发达，因而基本上处于贫困状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步履蹒跚。沿海客家在近代史上较早接触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在今天的改革大潮中，又处于开放的前沿阵地，因而观念更新快，现代意识强烈，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生产力水平也有较大提高。海外客家在数百年前即冒风涛，涉世浪，远赴南洋等地从事垦辟事业，因而富有勇敢、冒险的精神，经营产业的谋略及竞争奋进的意识，故海外多客家巨子。三种类型要区别研究，笼统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对客家研究初期一些外国传教士的评论，引述也应慎重，要特

别注意这些言论抛出的社会背景及用意。日本学者中川学先生认为 近代客家研究是在 19 世纪广州门户开放和香港割让后，由欧美人开始的。进而他分析了这种研究的实质，读来很受启发。他说：“当时侵略中国的欧洲人，倾其全力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后又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运动的中心力量并成为败北者的客家，在天国灭亡之后，陷入了与广东本地人厮杀的泥潭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侵略者们实在担心的是他们会结成一伙来反抗外国侵略，在战争的后半阶段，看到土客对立有利可图，便把已经遭受挫折的客家称赞为‘血统纯正的汉民族’，借此激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对立情绪，从而削弱中国人团结成一个整体从事抵抗的力量，并进而使之四分五裂。他们站在最前线，满脸堆笑，赞不绝口，实际上是在构筑残酷的殖民地统治的思想体系，这才是从上个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欧美人的客家研究的历史本质，包括罗香林在内的客家研究者，由于没有正视欧美人的研究本质，结果，不就弄成自己作践自己吗？由于没有对这种本质予以正视和直言，日本的‘东洋史’和‘中国史’的研究者们，除了把浸透了罗香林辛勤汗水的客家研究翻译得错误百出而使罗氏蒙羞受辱之外，简直就没有做出一点有价值的研究”^{〔21〕}。中川先生的看法是深刻的，从引语的后一句，也不难看出他对山口县造等人研究结果的基本态度。

客家问题是一个民系的问题，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我们研究客家的历史和文化，旨在进一步丰富、深化我们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具体认识，丰富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在大陆改革开放形势下，通过对客家历史、文化的剖析，分清良莠，继承和弘扬客家人社会意识和文化观念中有价值的东西；扬弃落后、陈腐的因子，从而在现代化的路途中锐意进取，顺应潮流。

民系感情本是民族意识的内容，是民族自尊心产生的前提，是爱国主义的基石。但感情主义的研究，难免削弱理性的思考，不仅损害研究的准确性与科学性，使客家研究逐渐丧失其价值，而永远

为人冷落；而且易于滋生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消极心理，甚至还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伤害民系感情与民族感情，那就有违初衷了。因此 我们建议 在当前的客家研究中应尽量少一些感情色彩，多一些理性成分！

（汪祖德，江西师范大学客家研究所、历史系副教授）

注 释：

〔1〕吴泽《建立客家学刍议》，《客家学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王界云《动态把握客家文化“源”和“流”》，《社会科学报》（256）期1991.5.16 第四版。

〔3〕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古亭书屋，1975 年版。

〔4〕罗香林《客家源流考》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年版。

〔5〕对这种错误 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可参阅张卫东、刘丽川《论客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载张卫东、王洪友主编《客家研究》第一集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王东林《对客家民系研究成说的几点异议——论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的摇篮地位》，1991 年 5 月上海市首届客家学研究会交流论文。

〔6〕曾维才《谈谈先于客家民系生活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土著居民的成份——兼与王增飏〈客家与畬族的关系〉文商榷》 载《客家学研究》第二辑。

〔7〕〔8〕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结论》。

〔9〕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

〔10〕沈约《弹奏王源》。

〔11〕《南齐书·丘灵鞠传》。

〔12〕〔13〕《颜氏家训·勉学》。

〔14〕《颜氏家训·涉务》。

〔15〕《南史·侯景传》。

〔16〕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

〔17〕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3《孔氏谱序》。

〔18〕《文天祥全集·跋李氏谱》。

〔19〕转引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三章注一。

〔20〕〔日〕山口县造《客家与中国革命》。

〔21〕〔日〕中川学《华人社会与客家史研究的现代课题》载1974年亚细亚经济研究所戴国辉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转引自张卫东、王洪友主编《客家研究》第一集 刘丽川、张卫东译〔日〕周达生《客家文化背景考》。

关于客家源流与客家民系的思考

客家问题研究，在社会科学界再度成了热门话题。有的颂扬客家功业，有的客观地陈述客家历史；有人致力推行客家方言，有人呼吁要理性地研究客家。笔者觉得，研究客家确应坚持理性，即科学性，把它摆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例如关于客家方言，笔者赞成林嘉书《从文化角度谈谈客家方言研究》的论点：“低水平生产力 低层次平面垦殖农耕稻作文明以及血缘姓氏村社的结合，为客家方言土语提供了极好的延传条件”。作者着力论述客家方言与社会物质生活、与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的关系，不同意说“客家先祖文化和社会地位比较高，故而推说客家方言较多古中州之官音”^{〔1〕}。

笔者为为了解客家历史实际，于 1991 年 10 月到赣南进行社会调查。采访中有当地干部问：“客家”是什么 如何认定客家 究竟指哪部分人？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很不容易。依当地群众的说法，客家是明末清初从闽广迁移过来的人。照学者们的见解 客家渊源极古 若具体分析 又是众说纷纭。何谓客家人 仍然是客家研究中的首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不在于抽象的空洞推理，而在于对具体事实的综合分析。

研究者在解说客家人这个问题时，把它和客家的源流连在一起。《客家人界定初论》一文认为：“罗香林所著《客家源流考》一书，论证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南迁分五个时期，第一次东晋‘五胡乱华’，……台湾中央大学范缙教授则认为客家人来源有三，

第一批来自秦朝，……可见，罗香林大师所说五次，再加上范绮指出秦朝一次，应算六次为宜。李松庵先生所写《客家人的几次南迁初探》一文，就汉民族六次南迁形成客家民系的历史，作了简明的概述，可看成是客家源流论的综合。^{99〔2〕}

这个论点，把中国人口迁徙和客家问题等同，把汉民族的南迁看作客家民系形成。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我国历史上北方人口的南迁，可以从秦朝说起，但是，秦汉时代迁居南方的北方人不是后来的“客家”。不仅如此，即便两晋、隋唐时代南迁的北方人，也不宜笼统说都是客家人。客家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应该是宋代以后的事情。

笔者在《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一文中曾说：“客家是历史上南迁的北方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在迁徙中逐渐形成，形成后仍在迁徙演变之中”^{〔8〕}。这个看法我依然不改。该文的重点在于说明客家与人口迁徙的关系，尤其是客家人开发江西山区的贡献，没有对客家源流展开分析，没有具体论述客家民系。这些不足之处，本文将作出弥补。

一、秦汉时期南迁的北方人不是客家

我们所研究的客家，或通常说的客家民系，是指生活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山区、讲客家方言的汉族人。他们的先辈是由北方逐渐迁徙过来的，但是，“客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客人、侨人。在人口迁徙的范畴中，土著与客籍是相对的，没有固定不变的土著，也没有世代相承永不变化的客籍。人口迁徙是普遍性的、经常发生的社会现象，人们生活在变化万千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家族的成员及其后代，不可能永久居留在一个村落内。由客变土和由土变客的现象是相辅相成、同时产生着的，也是普遍而经常出现的。今天的土著是昨天的客籍，现在的客籍将是未来的土著。同治《义宁州志》登录了客户人丁数目之后，写了这样的一段按语：“其居宁最久之老客

户 原有庐墓、田产、姻娅、亲族之可证 迥与客民不同 又各援例改客为土 不在此例。土客何常之有 矧日之棚客 即异日之土著也。”义宁州 今修水县 存在着“改客为土”的演变事实 其他地方同样存在这种过程。

秦汉这个历史时期里有大量北人南迁，无须赘述。可是，由于时隔久远，要列举出一个南迁家族的实例，决然是做不到的。北宋初年的乐史 是江西宜黄人 他写的《太平寰宇记》对江西历史的记述是可信的，但是对秦代的人口迁徙流动问题，也不能说得确实。例如他在南昌县吉州山条下说：“吉州山 在城西北一百九十里 与松门山相对 其上居民 云是秦时移此。”今天我们讨论客家源流，如果抓住“云是秦时移此”一句 即说这些人是客家的祖先 是最早的客家，恐怕是会招来捕风捉影之讥。

秦汉期间南迁的北方人，日久之后即成为南方的土著，根本不可能永保客人身份。“日久他乡即故乡”事例很多。南昌西部的上高县，是由东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9）的上蔡县演变而来的。顾野王《舆地志》载 当时将汝南郡上蔡县 今河南中部 人分徙于此，析建成县 今高安县 西境建县 仍用其旧县名而称上蔡 可以说是“纯客县”。然而 我们根本不能仅凭这一点 就说它是客家人的聚居区。事物是处于发展中的，不容许我们以孤立静止的眼光去认识世界。这批南迁的上蔡人 在新的居留地劳动生息 开基立业 几代人之后，没有回迁中原的念头，只留下对先祖的记忆，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改县名为望蔡。再经东晋南北朝以及隋唐 世事纷更，望蔡县屡经并合，或废或置，到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年）恢复建县 便“以地形高上 故曰上高” 没有了任何北人南迁的印记。上蔡——望蔡——上高 循着“改客为土”的历史道路发展 顺乎自然 合情入理。这些中原人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即已南方化——土著化了，今天还能说他们是客家人吗？可以凭这个史实去论证客家源远流长，为客家人南移增加了一脉根苗 吗 不能。上高人不会这

样认为，旁人也找不到他们属客家的依据。

类似的事例在岭南同样存在。《史记·南越列传》载 始皇谪遣南方戍守的北方人民 到达岭南后“与越人杂处”逐渐融合成土著。秦时任南海郡龙川县令的赵佗，河北真定人，他乘陈胜起义的时机 据有岭南 西汉初年称帝。为了稳定统治地位 赵佗尊重越人习俗 主动和越人融合 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表明在他这一代便开始土著化过程了。把首领称作“大老”的风俗 长期延续下来。而且闽浙赣一带畲族群众中也有这种习惯，在宋元史籍中，保留有不少称“大老”的记载^{〔4〕}。

有人说：“秦汉两朝中原华胄南移广东，……成为初期抵达广东的客家人的远祖。”真是这样吗 据权威的人口学专著《中国人口·广东分册》第二章：“广东的居民多是二千余年来从北方南来汉人之后代。……大体上可以分如下四个系统：1. 广府系。凡说广州方言者皆称广府人，集中分布于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和广东南路。广府人是最先迁入广东者。如秦发卒 50 万 特以南海为中路；汉会师岭南，又以番禺为据点，后留落定居者不少。2. 福佬系。……3. 客家系。客家人是入广东最迟者，始于南宋，至明清而渐增多。……4. 黎、瑶、畲……”。笔者认为 这段分析符合历史事实 是可信的。至于“华胄”问题 更难置信。进入岭南的秦军士卒、汉朝军队，留落定居下来者，能以“中原华胄”看待吗？又何以证明华胄才是“客家人的远祖”？普通百姓就不能传宗接代成为远祖？由此可知，广东客家人的远祖 不是秦汉时代南迁的中原人 他们的“远祖”，远远晚于秦汉时代。

福建的情况又不一样，不仅没有秦汉时代的北方人迁入，相反是当地土著被空壁迁出。《史记·东越列传》称 闽越与东瓯 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闽越发兵攻东瓯 东瓯求援 汉朝军队由海道往救，未至 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 乃悉举众来 处江淮之间”。《集解》徐广曰 东瓯王“举

其众四万余人来降 家庐江郡”。

闽越内部纷争，汉武帝立余善为东越王。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余善反汉。第二年冬，汉军攻入东越，闽越繇王杀余善，以其众出降，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⁹⁹⁽⁵⁾。东瓯与闽越都被迁徙一空，由闽中而至江淮间，成了江北人。因此，若是把视线延伸至秦汉时代，那么后世（如东晋时代）从淮南迁入浙闽的北方人，实有不少是汉武帝时代被强制移居江淮的闽人后代。这个关节，人们似乎都没有注意。

明了上述情况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那种强调闽广客家渊源遥远，说“（汉人）南迁历时二千余年，大的迁徙就有五六次，到福建、广东等地的汉人，实际上有的形成客家人，有的则形成福佬人，还有的形成广州人、海南人等等”是笼统而含混的，没有地区差别，不管时间先后，在模糊中把客家人的渊源追溯到秦汉时代，给读者错误的印象。所以，论述客家源流，切不可泛漫追踪。

二、东晋南北朝的侨人不是客家的开始阶段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纷更，尖锐对立，大批中原居民多次迁徙南方。大量关于客家的论著，类皆将本时期定为客家人的开始阶段，或称“后来客家民系渊源于此”。有的论者断言：“南朝齐、梁、陈各代也如晋宋侨置州郡县，给中原南下失去原籍的汉民以‘客籍’安置。这些流入江南各州县的外来户，为了生活只好进至南方诸省之山区，开始大都集结赣南，唐宋以后扩展至闽西、粤东的闽粤赣边境地区……所以我认为，溯源今日之客家民系的产生，上溯到晋宋较合理。”¹⁰⁰这篇文章的基本意思是重申本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的观点。这个观点给读者的印象是，东晋南迁的中原人是个统一体，此后一直受历史浪潮的推动，逐站往南进发，好比皮球掉入长江，随波逐流，只有位置移动，没有形体